

君主立宪之殇

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著

君主立宪之所以未能在中国实现，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清政府只想借立宪保住自己的权力不与他人分享，袁世凯则仅仅把立宪作为一个筹码，在清政府与革命党之间进行权衡。最终清政府被推翻，袁世凯在一片声讨中撒手西去。

解玺璋，北京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史的研究。

（此处为书籍正文内容，因文字密集且为竖排，主要内容涉及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君主立宪的推行过程及其失败原因等。）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014034409

B259.1
28

解玺璋
著

君主立宪之殇

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2696

B259.1
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 解玺璋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4
ISBN 978-7-203-08429-7

I. ①君… II. ①解… III. ①立宪君主制 - 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②梁启超(1873 ~ 1929) - 政治思想 - 思想评论
IV. ① K256.507 ② D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1739 号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著 者：解玺璋
责任编辑：高 雷
装帧设计：陆红强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15.25
字 数：198 千字
印 数：1—15000 册
版 次：2014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8429-7
定 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I MIN CHONG BUN
P.O. Box 255
YOKOHAMA
JAPAN



第 壹 號

光緒二十八年元月一日
明治三十五年二月八日

●本號要目

拿破崙像 俾士麥像

新民說一

近世文明和通二大家之

學說(上)

新史學一

地理與文明之關係

論教育當定宗旨

論學術勢力左右世界

軍國民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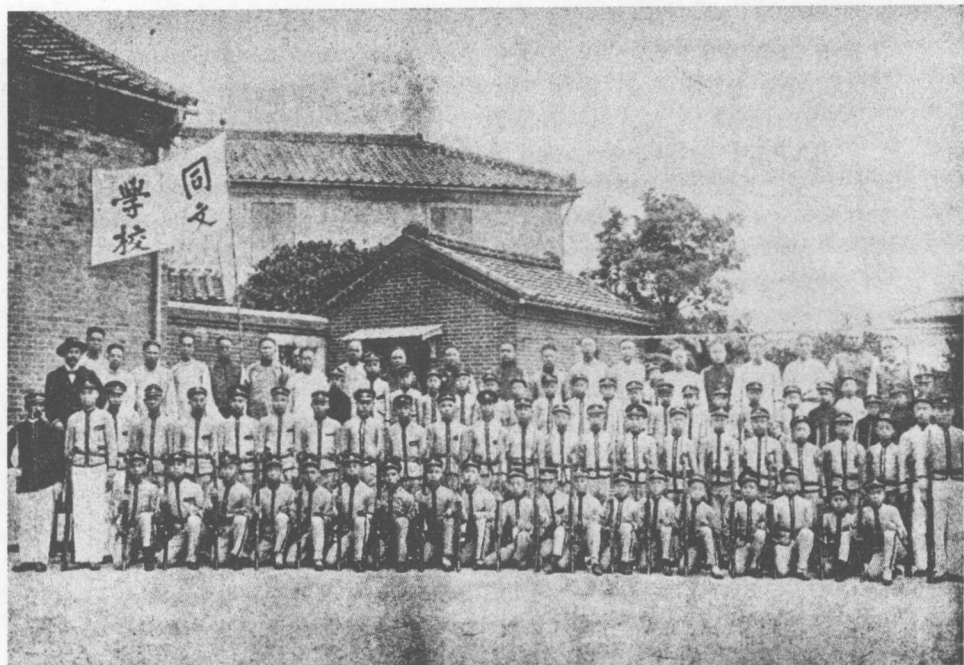
飲水室自由書

新智識之雜貨店

切灰夢傳奇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每月一回朔望發行



神戸同文学校兵式体操之图



旅美干城学校学生步操图

大清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本明治四十三年二月十三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每月三期逢一日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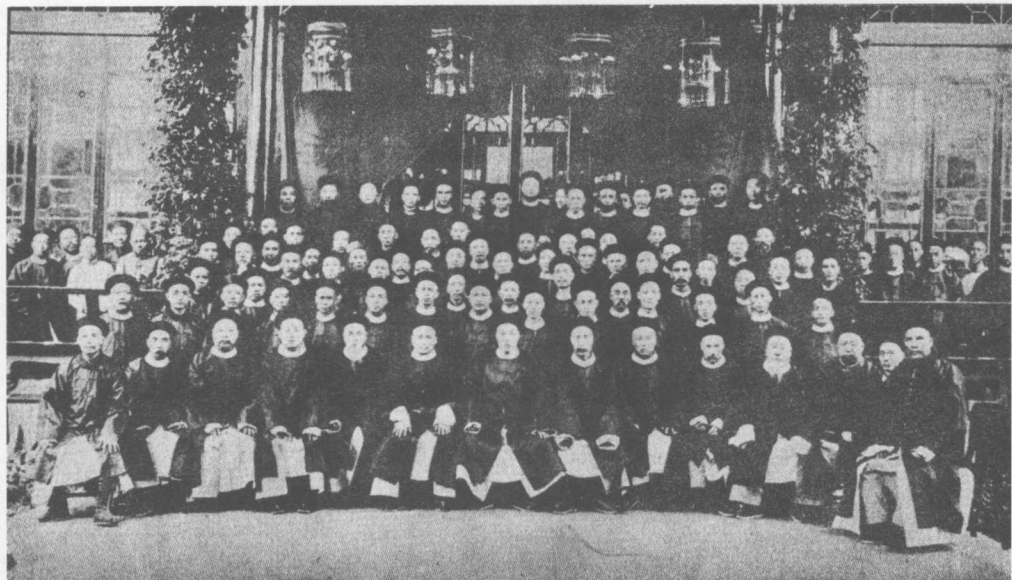
國風報



日一十月正年

期一第年一第

国风报



广东咨议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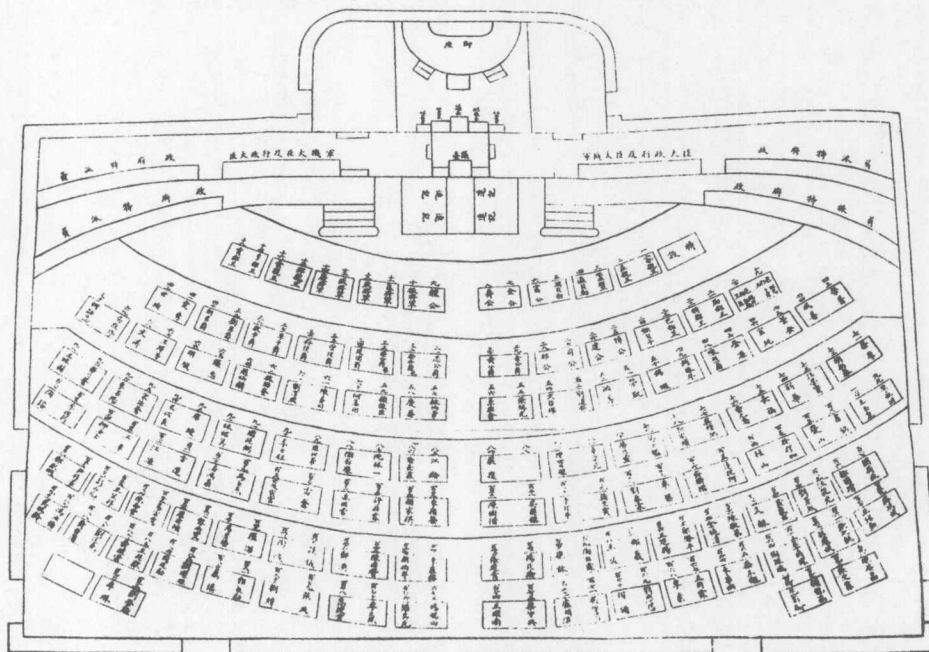


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



大同学校秋季兵操图

資政院議場座位圖



資政院議場座位圖

目 录

绪 论 晚清“自改革”思潮的兴起 /001

- 一、改革者的第一声叹息 /005
- 二、经学异端带来政治新说 /008
- 三、改革开放是历史大趋势 /015

第一章 梁启超走到了历史的拐点上 /029

- 一、甲午战败，败于守旧强而革新弱 /031
- 二、康有为抄袭廖平的一段公案 /035
- 三、康有为的特殊贡献 /039

第二章 梁启超的学术源流与思想构成 /049

- 一、终于和康有为走到一起 /051
- 二、与黄遵宪、严复相识相知 /061
- 三、谭嗣同的精神遗产 /079

第三章 梁启超初识君主立宪 /085

- 一、只有君主立宪可以救中国 /087
- 二、中国宪政之时机已到 /100

第四章 当立宪遭遇革命 /107

- 一、革命还是立宪，两难困于内心 /109
- 二、民族主义不等于排满 /115
- 三、共和革命不适合中国国情 /118

四、没有自由意志，何来国民公意 /126

五、站在清政府与革命党之间 /129

第五章 新民为立宪当务之急 /135

一、国民政治自觉是立宪根基 /137

二、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140

三、梁启超是如何想象“新民”的 /142

四、严重的问题在缺少公德 /145

五、私德、公德，不可偏废 /152

六、学问之道：正本、慎独、谨小 /155

七、新民必备的两个条件 /160

八、非有自治，则无以言国治 /163

九、梁启超对西方思想的“误读” /167

十、梁启超的自由观 /170

第六章 革命易成与立宪难成 /177

一、立宪感动中国 /179

二、清末立宪的第一个小高潮 /184

三、官制改革成各方争夺焦点 /187

四、少壮亲贵借立宪疯狂揽权 /193

五、国会请愿风潮三起三落 /197

六、资政院欲有所作为 /205

七、立宪派也要革命了 /215

八、清政府帮助制造革命者 /220

九、终与宪政失之交臂 /224

十、君主立宪黯然落幕 /229

绪 论

晚清“自改革”思潮的兴起

1912年1月1日（清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临时大总统孙文（中山）自沪抵宁，宣誓就职。中华民国遂于当日宣告成立，并以这一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尽管第三天袁世凯便致电孙中山，提醒他，国体问题尚待国民公决，意思就是说，君主共和还不一定呢。但时至当日，即使孙中山不坚持，君主共和似乎也已无须再计。

事实上，自武昌事变以来，各省响应，两三月间，全国舆论已日趋于革命和共和。虽有北洋军诸将于1月1日通电反对共和，但我们宁肯相信这是袁世凯背后指挥的一次集体表演，因为，同是这些人，1月26日则再次通电，宣布赞成共和。

这时，清朝的灭亡只剩下方式和时间的问题了。2月12日，宣统下诏辞位。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宪法的方式将国体确定为民国。同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宣誓就职。

清王朝的终结，不仅终结了一个朝代，而且终结了自秦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以及与君主制息息相关的君主立宪制。无论是宣布预备立宪的清政府，还是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的梁启超，此时此刻，都只有抱恨而已，尽管已经有了《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君主立宪还是与中国人失之交臂。

其实，梁启超在武昌事变之初就已看清了时势变化的潮流，他在最后所做的努力，不仅表明了他的心有不甘，再思奋起一搏，而且也是他对中国最终选择民主共和制的担忧，如果非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不仅不能致治，反而会天下大乱。他在宣统三年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对君主立宪的无望发出了沉痛的叹息：

呜呼！吾中国大不幸，乃三百年间戴异族为君主，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令此事殆成绝望，貽我国民以极难解决之一问题也。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侮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吾度。盖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不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十年来之所以慎于发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计也。虽然，吾盖误矣。今之皇室，乃饮鸩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貽我中国以难题。使彼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条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则吾民虽长戴此装饰品，视之如希腊、那威等国之迎立异族耳，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夫国家之建设组织，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太息也。（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44—45页，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

君主立宪制是梁启超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体制。它既是戊戌变法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君主制内部“自改革”可以达到的最高目标。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彻底终结了君主制内部一切“自改革”的可能性。一般说来，人们习惯于把民主共和的成功和君主立宪的失败归结为后者折中调和的不彻底性，甚至归结为他们封建士大夫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阶级属性。而百年之后我们回望历史，发现历史并不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所讲的那样简单，泾渭分明。我们可以说，康有为、梁启超，乃至更多人为君主立宪所做的努力，“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者导言，2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版）但这个过程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此过程中，三种导致巨大变革的力量，即西方列强、革命党、立宪派之间的拉扯、抗衡和冲击，以及三种力量与清廷旧势力之间的矛盾、纠葛和相互利用，都呈现出非常生动的面貌，他们的此消彼长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改革变迁的绚丽图景，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遗产，启发后人去思考和借鉴。

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回到那个历史现场，看看我们的先人在那场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是如何应对、如何思想、如何行动的。

一、改革者的第一声叹息

风起于青萍之末。

中国近现代变法改制的第一声叹息，发生在清嘉庆五年，公

元1800年。主人公是翰林院编修、著名汉学家兼诗人洪亮吉。前一年，即嘉庆四年（1799），洪亮吉结束了《高宗实录》第一分册的修撰，已请假归里。临行前，他怀抱一腔忠诚，上书言事，写下《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近六千言，成亲王永瑍上闻，嘉庆皇帝逆鳞被批，赫然震怒，即交军机大臣与刑部严审，以“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后奉旨免死，发往新疆伊犁，并有“不准作诗，不准饮酒”之谕。这已是嘉庆五年（1800）农历新春，四月以来，京师干旱无雨，至立夏，旱情更加严重，不仅影响到小麦的生长，连宫廷饮水也发生困难，皇帝亲自祈雨，亦不见效。嘉庆深感不安，遂下罪己之诏：“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转引自洪亮吉《洪亮吉集》第一册，刘德权撰前言，4页，中华书局2001年10月版）真是上天有灵，此诏既颁，六月就下了雨。洪亮吉也因此回到故乡常州，自号“更生居士”，修了更生斋，读书自娱，直到9年后病逝于家中，享年64岁。

洪亮吉自有敢言之名，他的《言时政启》更是指陈时事，直言无隐。他在谏言中对嘉庆亲政以来的作为（其实是不作为）表示不满，认为“机局尚未转者”，其原因就在于：“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同上，223页）难怪嘉庆读罢要“震怒”，这里的每一句话都直指嘉庆的“软肋”，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急迫的，对上要求朝廷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对下要求士大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所言要关乎国计民生、世道人心，反对毛举细故、不切政

要。而士风和官场风气的腐败，更让他忧心忡忡，官员们“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而“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急急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国计民生，非所计也，救目前而已；官方吏治，非所急也，保本任而已。故虑久远者，以为过忧；事兴革者，以为生事”。

（同上，225页）士大夫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最让他担心的，是“士大夫之不务名节”，因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而且，“幸有矫矫自好者，类皆惑于因果，遁入虚无，以蔬食为家规，以谈禅为国政。一二人倡于前，千百人和于后。甚有出则官服，入则僧衣。惑智惊愚，骇人观听”。（同上，227页）

洪亮吉案的意义就在于，在经历了乾隆朝的万喙息响，鸦雀无声之后，仍有知识精英，即士大夫记得自己的政治责任和义务，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孔飞力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描述了18世纪90年代的大清帝国如何从昔日的辉煌开始显露出多种危机后，指出了帝国走向现代必须解决的三道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8页）洪亮吉的行为对于孔飞力的提问来说也许不是一种自觉的回答，他写《言时政启》，仍然怀抱着“受恩不酬，非国士也；有怀不尽，亦非人臣所敢出也”（洪亮吉著《洪亮吉集》第一册，223页）的传统心态，但其影响所及，却给后来者一种精神上的鼓励，使得越来越多的士大夫以他为榜样，要在万马齐喑的时代发出变革、维新的声音。